红军战士李友禄

1918年8月，李友禄出生在宁夏隆德县神林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5年8月的一天，身为长工的李友禄毅然在家乡参加了过境隆德的红军队伍。1938年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班长、排长，新四军连长、副营长，解放军华野部队营长等职。他是隆德县最早参加革命的一名红军战士。1969年他离休回到原籍隆德县。当地人崇敬他，“老红军”成为他的代名。

李友禄参加红军的过程是这样的：一天，在地主家干活的李友禄，听大人们偷偷议论，山后面的单家集、兴隆镇来了红军，他便暗自想去见见这些人，看是啥样儿。他不小心说漏了嘴，让地主老财听见了，就吓唬他说：“共产党红军歹得很，抓住小孩就用刺刀往死里捅……”坚决不让他去见红军。给别人当长工的他，没有自由，只有老老实实给人家干活。过了两天，他去地里干活时看到有一帮既像兵又像庄稼汉的人从他干活的地头路过，其中有一个人还朝他喊道：“喂！小鬼，过来。”他便走过去，那人就给他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政治上平等。他听不懂什么是政治。只听明白了一句话就是“大家穿衣吃饭都一样”。那人还说要打土豪，分田地，他也听不懂土豪是啥，还以为是在田里用木榔头打土疙瘩，填壕沟的事，这多没意思，刚皱眉，那人便看出了他的心思，就急忙补充解释道：“土豪，就是欺侮穷人的地主。”噢，他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经那人的一番说服动员，闯天下的念头油然而生，决心跟那人走，参加红军。便高兴地笑着说：“好，让我回家穿一件衣服咱们一起走。”说话间那人便快速脱下自己的衣服让李友禄穿上，就这样李友禄义无反顾的跟着红军走了，一去就是30多年……

李友禄投身革命后，思想坚定，作战勇敢，入伍8个月就任班长。1936年11月，在山城堡战斗中，李友禄奉命带领尖刀排与敌人肉搏，攻下敌人一座碉堡，为部队打开通道，为此荣获战斗英雄称号。抗战初期，在平型关战役中，李友禄率警卫排强冲敌阵，与日寇白刃拼刺。因他力大、技精、神勇，连毙日寇，声名鹊起。在房龙岗战斗中，李友禄率新四军一连士兵，拒敌守隘，击溃日军300多人的猛烈进攻，完成了保卫房龙岗镇的任务，荣立二等功。在沙沟战斗中，俘虏日军数人。1943年，他所带的连队一排在整军整风大生产运动中，成绩显著，被评为全团模范。

解放战争时期，李友禄参加了八次重要战斗，数次负重伤，屡立战功。1947年4月，运城阻击战中，其营在申家场担任正面防御任务。国民党军队飞机炸、大炮轰，以多于我军20倍的兵力轮番冲击，战斗持续进行了20多天，胜利掩护了刘邓大军的军事行动。江阴渡口战斗中，5天行军千里，国民党部队以为神兵从天而降。解放上海战斗中，李友禄任28军警卫营营长，他机智的利用坑道接近敌人钢筋水泥子母堡，消灭敌方两个营。李友禄最初的档案记载着感人肺腑的一页：入伍作战100次，负伤9次，身留二等乙级残疾；荣获房龙岗战役金星奖，淮海战役一等战斗英雄，马木集战役纵队嘉奖，上海战役纵队嘉奖等。

新中国成立后，李友禄奉调福建第五军分区警备团任副参谋长、参谋长。1955年2月，被授予少校军衔。1956年4月，被授予团级军职。

1958年11月，经批准退役转业，赴福建省体委工作。李友禄转业到地方工作，经历了3年困难时期、“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上级组织鉴定为：“生活简朴，清廉正直。”整党中，“自我革命精神好，整党后进步很大。”按常理讲：老红军离休后，应当静下来享几年清福，安度晚年才是。但从苦水中泡大的他是从枪林弹雨中摔打爬滚出来，回乡休息期间，根本闲不住，好像贪图享乐安逸与他今生今世无缘。

1969年，李友禄离职休养，回到家乡后，正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军事备战年代。革命传统教育风靡盛行，从革命老区回家的他，自然而然地成为隆德县城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在那个年代，他经常深入工厂、学校、农村、机关单位，对工人干部学生和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每年至少在全县范围内作传统报告30多场次。他所作的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内容极为丰富，大都是战斗题材：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等内容，真实生动，很适合青少年学生。他所讲的故事，语言朴实贴切，引人入胜。这些报告，风趣幽默，时而让人捧腹大笑，时而紧张得使人憋气。他讲得是那样津津有味，听了这一场还想听下一场。从学校到工厂再到机关以至农村，受教育面非常广泛。

老红军不只是讲得动人，做得更动人。他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始终保持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作风。从他匆匆而来到悄然离去，他一直穿那件绿不绿、黄不黄的老式军装，好像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就连寒冬腊月也没有见过老红军披过一次大衣。也许是他身子骨硬朗的缘故吧。再说他的吃，常言道：“主家千万有，邻居一杆秤”。李友禄的邻居从来没有听他家到外地捎买过牛羊肉，也没听说托外地的友人带回海鲜，经常见到的是老红军自己提菜篮子买菜，偶尔还要跟人讲讲价钱，有人说：“老红军那么多的钱，买鸡蛋还跟老百姓三二厘讲价钱。”其实，他讲价钱是跟人逗着玩，最终因钱找不开，往往出个高价钱。住的也一直是幼儿园改建的两间老式架子房，带一点小院子，大门连个架子车也进不去。就这样简陋的房子，他一住就是10多年。直到离开人世前两三年才搬进新院。出门总是两条腿，从来不坐公家的车。每次回神林铺老家，经常乘坐平凉开往静宁的过路班车。曾有两次，老家有急事，当时等不住班车，才张口要了县政府的北京吉普，随后又付了油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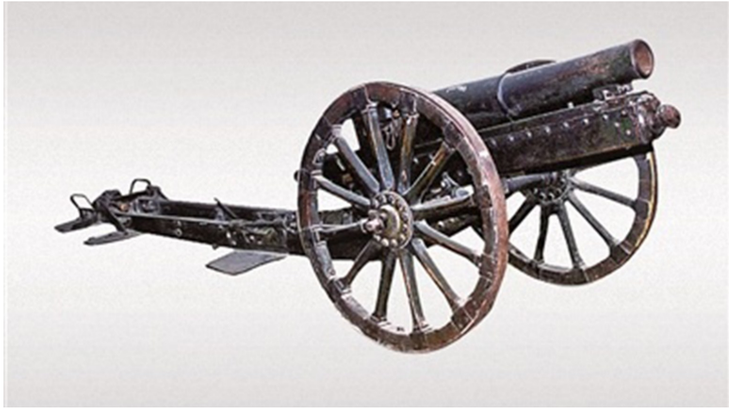
李友禄于1984年5月14日逝世。追悼会异常隆重，灵堂设在县政府大礼堂。整个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挽联挽幛挂满了整个大厅，大厅正中央安放着老红军的棺木，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簇拥着花篮与花圈。敬献花圈的有党政机关干部，也有学生、工人，更多的是生产队的社员们。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参加追悼会。

老红军李友禄逝世后，按照遗愿，安葬在他参加红军后打响第一枪并击溃国民党守城部队的地方——隆德县北象山上。

如今的北象山虽不是松柏茂盛，但也草木苍翠，郁郁葱葱。每年清明节，县城中小学校总要组织青少年学生为老红军清扫坟墓，祭奠前辈英灵，寄托哀思！

（据《红二十五军在隆德》）

一门山炮的万里长征



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

万里跋涉来到陕北时，红军最初携带和途中缴获的重型武器装备已所剩无几。有一门山炮却被红军战士万分珍视。它作为西北野战军炮兵队伍所装备的重武器，随军南征北战，在保卫陕甘宁边区、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路马驮人扛，红军战士将这门山炮带到了陕北。这门山炮编号587，名为“七生五过”。生，是英文“厘米”的音译，“七生五过”即口径75毫米。该炮由上海兵工厂于1927年模仿德国克虏伯75毫米口径山炮制造，炮身长1050毫米，最大射程4300米。这门山炮从武器装备的角度看并不稀奇，它能让红军战士丢弃其他辎重装备，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将它带到陕北，这就和它不同寻常的经历有关。

1935年4月，国民党鄂军纵队司令兼第58师师长陈耀汉在得知红二、红六军团决定开赴湖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消息后，急令所辖两个旅先行出发，与自己和西面的张振汉部合力截击，妄图歼灭红二、红六军团。红军在陈家河利用有利地形，率先歼灭敌军两旅中的172旅。陈耀汉闻此消息慌忙回窜。随后，红军冒雨急行军赶往陈耀汉南窜的必经之路桃子溪，对敌发起猛烈攻击。此战，红军歼敌一个师部和近两个旅，缴获大量武器装备，这门山炮便是其中之一。这对于缺少重武器的红军来说，可谓如获至宝。红军立即用该炮装备自己的炮兵营，投入反“围剿”作战。

同年6月，在忠堡战役中，红军炮兵营用山炮配合步兵作战，一举炸毁敌军碉堡，敌军司令张振汉被俘。经过红军的思想教育，炮兵专业出身的张振汉加入红军，成为红军学校的教员。在随后的龙山围困战中，张振汉还亲自上阵操作这门山炮，两发炮弹就摧毁了敌军一座碉堡。

11月，红二、红六军团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长征，这门山炮也随着红军指战员踏上漫漫征途。突破乌江时，红军利用这门山炮协同其他武器压制住对岸的国民党军火力，为红军战士抢渡乌江争取了宝贵时间。

长征途中，为携带这门重达几百公斤的山炮，红军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宁肯饿肚子、吃苦流汗、手抬肩扛也不舍得丢掉。过草地，炮身太重无法拖行，红军战士就把山炮拆开来，分组携带行军。一路上，一名战士倒下了，山炮部件又转到另一名战士肩头。红军战士以坚定的信念、用鲜血和汗水，硬是把这门山炮抬到了陕北，成为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

抗日战争中，这门山炮被编入八路军第120师，在雁门关、齐会、陈庄等战斗中大显神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龙元帅专门让人找到这门山炮，并将它交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展示。

（据《中国国防报》）

动员与觉醒：陕甘宁边区妇女参政议政之路

参政议政是妇女政治权利的重要方面，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指标之一。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参政议政活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妇女行使政治权利、全方位探索妇女群体如何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典范，为今天的妇女参政议政和妇联组织力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研究陕甘宁边区妇女参政议政历程，明确妇女参政议政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探索动员妇女行使政治权利的实践，将妇女参政议政的重要价值置于全社会经济发展脉络中，对于指引新时代提升妇女参政议政能力、推动男女平等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妇女参政议政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

陕甘宁边区妇女参政议政加速了妇女解放意识的觉醒。193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妇女工作大纲》，确定妇女工作的斗争纲领为“从争取抗战民主自由中争取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改善与提高妇女地位，反对一切封建束缚与压迫”。在民族救亡图存之际，妇女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成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一股不可或缺的革命力量。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内容之一，动员妇女参政议政、确保妇女行使其政治权利能极大地激发广大妇女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觉悟，进而积极踏入公共领域，参与到更广泛的政治生活中，以民主“实践”促成民主“实现”，推动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范围延伸至陕甘宁边区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组织是妇女群体参政议政的“领头雁”。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重视发展女党员，将妇女解放视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内容之一。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提出“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其中明确“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奋斗目标之一。1939年2月，《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颁布，要求建立健全各级党委妇女部与妇女运动委员会，使其成为各级党委的重要工作部门，动员全党女干部和女党员开展妇女工作，注意吸收女党员、培养女干部。一大批成长起来的女干部、女党员在推动妇女全面参政议政的进程中起到了模范作用。随着妇女参政议政能力与妇联组织力的提升，一批批优秀先进的女干部走进群众中大力动员边区妇女投身解放运动，长久以来生活在闭塞环境中，深受传统封建文化禁锢的陕甘宁边区妇女开始意识到参政议政是其基本政治权利，她们走出家门，走向广阔天地。

宣传与动员是妇女参政议政的关键

实事求是地制定动员妇女参政议政的具体方法。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路径和实践方式根植于边区社会现实。1938年，邓颖超、孟庆树在庐山妇女谈话会上的《关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概况的报告》中介绍了当时边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实际：“大多数妇女缠足不识字，一般人民仍是重男轻女，在妇女工作的进行中仍常常遇到障碍和困难。”如何宣传妇女参政议政的必要性、如何提高妇女参政议政能力，是动员广大妇女行使政治权利的两个重要问题。边区政府和各级妇女组织也就此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一方面是持续深入宣传各级妇女组织的工作情况，动员团结广大妇女积极向组织靠拢。早在1937年10月14日《新中华日报》刊出的《妇联会征求会员》就呼吁：“我们联合发起组织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已经成立了一个筹备会，现在开始征集会员，凡边区妇女团体或个人，不分阶层、党派、宗教信仰，均欢迎参加。全边区的姐妹们，勇敢地来吧！”1938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召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前，边区妇联给各级妇联的指示信中就写道：“我们应该发动农村妇女多多提案交给议会通过，以解除我们妇女的痛苦，以在抗战中起更大作用。”各级妇女组织积极团结广大妇女群众，动员妇女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参政议政解决自身困难，在行使基本政治权利的过程中，让“民主”具体化为日常生活中可感可及的实事。

另一方面是根据本地区妇女群众生活的真实境况，为广大妇女参政议政的具体实践探索出多种高效便利的方法。为了更好地动员陕甘宁边区广大妇女群众，边区政府举办选举训练班，并将参与训练班的人员派到各地培训参选干部，普及选举知识和政策、指导妇女参选，各级妇联干部深入到妇女群众中进行参政议政的宣传与动员。考虑到大量妇女不识字，边区政府创造了投豆、画圈、画杠、烧洞等选举方法，以便妇女群众能清晰顺利地表达自己的意志，自主地行使政治权利。

妇女参政议政程度与社会经济水平互为积极因素

妇女参政议政的全面推进令边区民主政权建设逐步完善，保护妇女儿童的多项提案被提出、通过与推行，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果一一落到实处。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选举高敏珍等19位女性当选参议员，她们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议，提出《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这一提案包括各级参议会应有25%的女参议员、废除一切歧视妇女的制度等7条意见，最终以多数票通过。随着女选民的增加、女参议员的当选，各类聚焦保护妇女儿童切身利益的提案得到重视。1941年6月21日《解放日报》的社论《动员边区妇女参加选举运动》号召全边区妇女实践政治权利，文中详细记述了当时陕甘宁边区妇女参政参选的成效，并举例：“延安市裴庄乡女选民数目占选民之二分之一，绥德全县460位参议员中有80个女参议员，占全体参议员六分之一，各地关于动员妇女生产，保护产妇儿童，禁止买卖婚姻等提案之通过。”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参政议政中，陕甘宁边区妇女儿童的现实生存处境受到广泛关注，妇女儿童面临的实际困难才能有效转化为党的具体工作内容，妇女儿童事业得到全方位发展。

妇女参政议政的进程推动着边区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提高。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劳动中，涌现的一批妇女劳动模范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1943年，辛勤劳动、耕种得法的马杏儿被授予“妇女劳动英雄”称号，林伯渠亲笔为其题写“妇女光荣”。随后，还产生了马杏儿为原型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以民谣改编的歌谣和秦腔《马杏儿》等。1943年，《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一经公布，大生产中热火朝天的妇女纺织运动迎来高潮。陕甘宁边区各级妇联深入基层推广纺织技术，在各地建立起妇女纺织队伍。同时，中央妇委和陕甘宁边区妇联成立的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合作社也成为高效推动妇女生产的组织，建立了团结妇女劳动力量的重要场所，这也成为广大边区妇女走出家门后的公共活动空间之一。女性主体意识和自我认同感通过劳动而不断强化，在经济生产中形成的妇女劳动组织也有效地动员并吸纳了更多妇女参与到公共事务和集体事业中。妇女参政议政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彼此促进，是互为正相关的积极因素。

陕甘宁边区妇女的参政议政之路，为新时代提升妇女政治权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增强妇女参政议政意识、提升妇女参政议政能力，以及加强妇联组织力量是实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必要途径。新时代推进妇女参政议政，应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基于深入调研结果，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选择动员妇女参政议政的有效方式并付诸实践，并充分把握好妇女参政议政的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密切关系。

（据《中国妇女报》）

红旗漫卷 山川巨变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

山势险要，沟壑纵横，盘旋曲折。为了摆脱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果断指挥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

岁月如歌，沧海桑田。无论单家集夜话的烛光，青石嘴战役的枪声，还是将台堡红军大会师的欢腾，犹如润物无声的红色基因深深融入宁夏各民族群众的血脉。

光阴荏苒，春华秋实。无论在此后的烽火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奋斗历程中，伟大的长征精神，星火燎原地化为人心汇聚的磅礴力量，令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脱胎换骨。

历史铭刻《长征谣》

1935年9月20日，北上红军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在甘肃岷县哈达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根据革命形势作出了声东击西、佯攻天水，北上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10月5日，三个纵队7000余人兵分两路，由静宁界石铺入固原继续向陕北挺进。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上，国民党调集重兵在六盘山一带重重设防。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果断指挥红军迅疾翻越六盘山。

1935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六军团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在将台堡以南的兴隆镇会师。红二方面军将总部设在将台堡。红一、二、四方面军相继到达会宁、将台堡地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从此宣告长征胜利结束。

1935年10月5日，中央红军从甘肃进入宁夏固原西吉县。当晚夜宿单家集后，毛泽东拜访回族阿訇马德海，与之彻夜长谈。单家集之所以在红军长征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因毛泽东来过这里，还源于翻越六盘山之前，1935年8月、9月，红二十五军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先后三次路经单家集村，制定了著名的“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开辟了“回汉一家亲”的先河。

红军向六盘山挺进途中，在青石嘴打了一场迂回歼灭的漂亮仗。10月7日凌晨，红军离开单家集沿小水沟登上六盘山。这时突然发现有两个连的敌人进入六盘山下的青石嘴，挡住了红军前进的道路。毛泽东当机立断，给我打！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半个小时结束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不仅没有伤亡，还俘虏了200多人，缴获了140匹马，8辆马车和一些重要的军需物资。

青石嘴战役后，毛泽东翻越六盘山，沿战国秦长城疾步行军，7日晚夜宿小岔沟。第二天，毛泽东登上六盘山主峰，诗兴勃发，吟出《长征谣》：“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年12月到陕北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将其润色修改为气势磅礴的《清平乐·六盘山》诗篇。

深情书写红色六盘

将台堡红军大会师标志着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六盘山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从此摆脱了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红军在甘南打过腊子口战役之后，下一步向何处去？红军领导层思想不是很统一。在哈达铺，毛泽东从战利品中发现一份《大公报》，上面有报道说“陕北多数地区已被刘志丹赤匪控制……”于是果断决定，红军主力翻越六盘山，向陕北苏区汇聚。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果然使红军实现历史性转折走向了胜利。

1935年10月5日，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中央领导机关分两路进入今固原市西吉境内。傍晚，红军部队来到单家集，受到当地回族群众热烈欢迎。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百思不得其解，问过当地群众后才得知，在一个多月前的8月15日，由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经过单家集和兴隆镇一带，为当地百姓挑水干活，还赠予清真寺阿訇“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匾和肥羊等礼品，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红二十五军一到单家集就宣布“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即：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禁止打回族的土豪；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生活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住在王河村的一名红军伤员，发现当地马铃薯品质好，于是手把手地教村民做粉条。从此这里有了致富产业。直到今天，当地人还亲切地称粉条为“红军粉”。

（据《经济日报》）